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扰人未改善

新华社济南10月15日电 10月13日是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制定的《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服务规范》实施满1个月。该规范对困扰广大消费者多时的智能电视开机广告进行了限制，其中包括明确要求厂商在销售时必须告知消费者开机广告的服务内容、开机广告不能超过30秒且要有明确的关闭提示信息等内容。

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前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扰”人问题并未明显改善，部分厂商未按规范执行，有的厂商整改“走过场”，还有品牌通过系统升级新增开机广告。

规范虽来，广告未走

记者发现，当前市场上多数品牌智能电视开机广告设置实际情况离规范要求仍有较大距离。

——广告仍多且无法关闭。山东济宁市民仲先生最近以4000元买了一台小米电视，每次开机后均须看完广告才能开机，令他苦恼。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联系了小米、熊猫、TCL、康佳、先锋、PPTV等品牌的客服人员，他们均表示产品有开机广告且无法关闭。

——旧机升级增广告。记者5年前购置的长虹某型电视此前并没有开机广告。最近记者发现电视开机后会出现15秒商业广告，广告结束后才正式开机且在播放过程中无法关闭，系统设置里也没有关闭广告选项。长虹客服人员告诉记者，旧电视进行系统升级后就会出现广告。

——关闭开机广告麻烦多。记者发现，长虹电视用户若想取消开机广告，需打电话给客服人员，告知电视型号和MAC地址，由厂商远程关闭；据创维客服人员介绍，该品牌部分产品的开机广告无法由消费者直接操作关闭。

——销售环节存在隐瞒或误导。记者在多家线下门店咨询时，少有品牌销售人员主动如实告知开机广告情况。在山东济南国美电器府前街店的TCL销售专区，销售人员称TCL电视没有开机广告，并现场开机进行演示。但记者注意到，演示电视并未接入互联网。该品牌在电商平台上的客服人员明确告诉记者，TCL相关产品“有开机广告”。

仲先生告诉记者，他在网上选购创维、TCL、小米等品牌智能电视时发现，有的品牌官方页面上有开机广告提示，但大多字体很小、位置隐蔽，且多未按规范要求标注广告时长、能否关闭或跳过等信息。

开机广告咋成“钉子户”？

专家表示，相关规范未能如消费者所愿迅速改变开机广告混乱现状有多方面原因。

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业务对企业利润影响巨大。多名业内人士表示，开机广告带来的收入对企业开拓利润增长新渠道至关重要。奥维互娱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系统层广告投放的收入达到23.7亿元，其中创维、海信、长虹、康佳、TCL等国产五大厂商的系统层广告投放收入为11亿元，占据46%的份额。某智能电视厂商公布的数据显示，其开机广告收入曾达170万元/天。

近年来国产电视领域竞争激烈，开机广告、会员业务等更是成为一些互联网电视品牌的重要财源。创维集团数据显示，开机广告等互联网增值业务是创维总体业绩良好的强劲动力。TCL财报数据显示，旗下互联网电视运营子公司雷鸟科技上半年增值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36.5%。

记者还发现，部分品牌电视能“强迫”消费者观看开机广告，成为其扩大广告收入的“卖点”。“电视节目插播广告时你还可以换台，但是开机广告你必须看完。”一家广告代理商告诉记者，当前不少广告业者都认为家庭大屏媒体广告的优势就是“强制收视”“到达率高”。

规范对相关企业约束力有限。依该规范规定，其内容适用于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网络视听（OTT）分会成员单位，其他厂商等可参考执行。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臧雷表示，该规范是一种团体标准，属于行业内的规范，仅对行业内签署遵守的单位有一定效力，不能约束该团体外的未签署单位。而且该规范中并未对违反相关规范者应承担何种责任进行规定，据此行业协会对成员企业的约束也就比较乏力。而且该规范也不能作为强制性执法依据，在支持消费者合法维权领域的作用比较有限。

想要电视“价格公道没广告”相关规范应“长出牙齿”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部分国外电视品牌明确表示不设开机广告，但在价格上明显高于国产品牌。记者从多家智能电视商家处得知，某韩国品牌产品普遍没有广告，开机只需要3秒时间。但该品牌产品价格在优惠后依然高于多数国产电视品牌同类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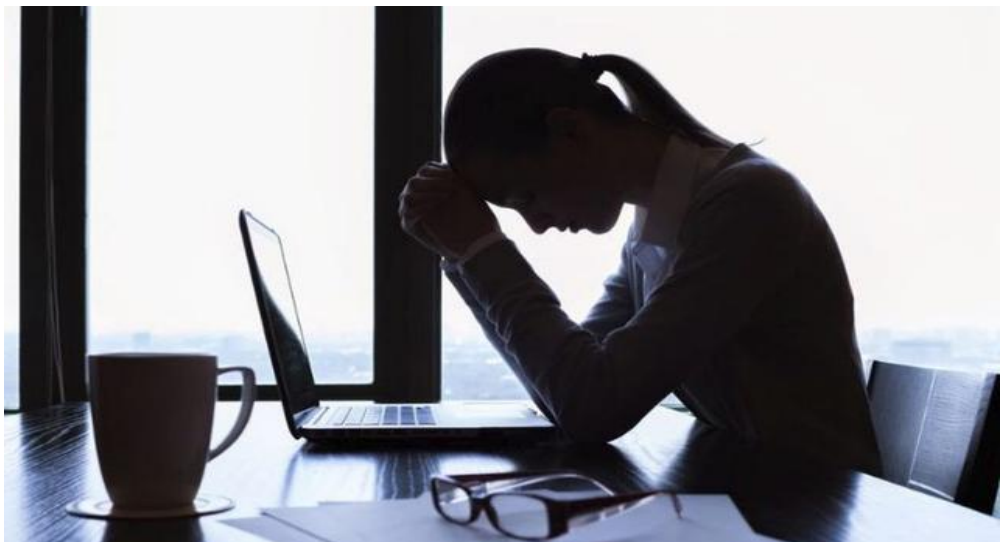
“厂商有权在系统中置入开机广告，但必须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刘坚勇告诉记者，当前多数国产电视厂商将开机广告作为重要利润增长点，以此贴补不断下降的整机价格。

但记者发现，某知名国产品牌的智能电视价格实惠、不带广告。该知名品牌一款4K电视售价为2399元，在同等规格和配置的国产电视中属于中下水平，且并不带开机广告，开机只要十几秒。

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张博文律师也认为，电视开机广告不告知、难关闭，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并违反《广告法》，但是要真正让相关企业感受到法律和行业规范的“牙齿”仍非易事。

他建议，对企业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强推“开机广告”的行为，消费者可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中国消费者协会也可考虑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显著增加企业违法成本。

京鲁律师事务所主任郝纪勇建议，主管部门可参考行业规范，就智能电视开机广告出台强制性规范，作为市场监管部门的直接执法依据，更有力地约束规范相关企业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



青少年自杀率飙升！请听懂他们的“求救”

身病易治，心病难医。全球青少年自杀率的飙升，正在成为这场疫情的次生灾害。“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就是想死”……这是自杀者的“告别”吗？不，这是他们的“求救”。

要么优秀，要么完蛋

滴滴答答的雨点敲打在玻璃窗上，脸色苍白的婷婷盯着看了很久。“我不开心，烦躁不安，只有割手腕的时候感觉舒服一点。”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杀的想法？”医生问。“很早以前，上个星期特别强烈。奶奶家在7楼，我趴在阳台上看过跳下去的落地之处。”

婷婷只有13岁。还有14岁的小颜、15岁的畅畅、16岁的云霓……他们都因为有自杀倾向或多次自杀未遂，被带到心理医生面前。

“这次疫情作为创伤事件的规模之大几乎令人无法想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心理学教授尤瓦尔·内里亚说，战争或恐怖袭击事件所引发的焦虑至少受到地域限制，而这次疫情的杀伤力“没有国界”。

某城市医院的门诊数据显示，今年以来，13～16周岁抑郁症伴随自杀倾向的患者占学生患者总数的比例很高。尽管自杀倾向中遗传和外部环境因素各占一半，但学业压力、亲子矛盾、深度网瘾、拖延惯性产生的心理冲突等，已成为学生群体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

“我爸爸脾气不好，他发脾气的时候我就想躲起来或者逃出去，但疫情隔离在家的时候我没办法”“我妈妈心情不好的时候，用棍子打我，用脚踹我的肚子”“我总是感觉有人在监视我，还听到有声音跟我说，让我去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俞国良认为，临床工作中接触到的绝大多数“问题孩子”，都有深层的原生家庭问题。父母的教养方式让很多患者很小就被植入了一些强烈的人生信条，比如“我不值得被好好对待”“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要么优秀、要么完蛋”。

值得警惕的是，教师的情绪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传导给孩子。考核压力、排名焦虑等导致的负能量，都被包裹在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里。

感谢那个“看穿”我的人

“初二之前，我对于抑郁症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张国荣跳楼自杀’上。”见到小圆儿的时候，她穿着明黄色的连衣裙，眼眸里有光。很难想象她曾经历过暴食、厌食、嗜睡、睡不着、自残、自杀未遂等反复折磨。

“熬过了初三，进入高中，抑郁这股势力又不知不觉中卷土重来。害怕新的一天、新的负担，适逢考试必出幺蛾子”“从小到大被戴上的高帽子太多，让我不能接受自己失败，又害怕自己成功”……

浙江省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张载福说，很多类似小圆儿这样的孩子，与身患重度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不同，有非常强烈的求生欲。他们所要逃避的是痛苦，而不是生命本身。“作践”自己的行为看似疯狂，却释放出了重要的求救信号。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就是想死”……这是一种“告别”吗？不，这是“求救”。

“当我们了解人们并不是想结束生命，而是想结束痛苦的时候，活下去，是我们背起当事人渡过的河，是我们与当事人相互搀扶走过的路。”湖北省某心理健康研究所心理学家杨微说。

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如果可以利用患者矛盾心理增强其求生欲，自杀的风险就可以降低。“我真的很感谢那个‘看穿’我的人，他是我的主治医生。”小圆儿说。

很多时候，想开了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小圆儿如今成为心理康复中心的一名志愿者。“我希望可以帮助那些和我曾经一样痛苦的人。”

当我们讨论自杀时，其实在讨论如何活下去

美国精神病医生马克·郭士顿曾将自杀者的心态概括为“八个无”：无望、无助、无力、无用、无价值、无目标、无意义、无所谓。直到实施自杀动作的那一刻，这些心态都处于波动变化之中。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则认为，社会规范、联系与义务越少的人，越可能自杀。人们需要义务及约束来为自己的生命建立架构和意义。

这些看似形而上的研究，其实都围绕着一个议题展开，就是从“终极”层面寻找自杀动机里的共性，然后更好地预防自杀。年轻生命对于“如何活下去”往往有着强烈的主观追求，而这种追求恰是预防自杀的突破口。

浙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赵国秋说：“我们需要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当作一项系统工程。启动危机干预预警系统，将心理危机干预应用于青少年群体的各种突发事件（如自杀等）的善后处理中。”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重新审视网络社交对年轻生命建立架构和意义的影响。“火爆的短视频行业背后，是一场对青年群体的孤独收割。”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馨蔚认为，孤独经济的兴起和年轻人自闭式社交的泛化背后，是日益庞大的空巢青年。孤独感泛化、低欲望心态蔓延、厌世自杀……为了摆脱这种惯性，必须帮助年轻人与网络社交达成“和解”，帮助他们走出“信息茧房”效应可能带来的极端化倾向。

最后，我们必须想办法说服伤痕累累的年轻生命，尽管看上去并不理想，但总还有其他的选择。绝大多数时候，“痛苦地活着”会比“死亡的解脱”更有意义。

上世纪70年代，穷困潦倒的美国抽象派画家马克·罗斯科在画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差不多同一时期，正在承受残酷迫害的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却没有选择自我了断，而是一边劳作一边坚持创作。多年以后，她穿着朴素的白衬衣，坐在一把老藤椅上，这样回忆起自己的选择：人啊，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就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新华社电**